

中国
文化杂说
— 民俗文化卷

卷

社

中国文化杂说

民俗文化卷

本卷主编 刘晔原 刘方成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文化杂说

主编 关立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杂说/关立勋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12
ISBN 7-5402-0770-1

I. 中… I. 关… II. 文化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14 号

策划 如 水
主编 关立勋 副主编 张润峰
监印 张景闻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香河第二印刷厂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张 369 千字 10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

印数: 1-5000 套 (全十册)

定价: 998.00 元

中国文化杂说

一、民俗文化卷

二、宫廷文化卷

三、旅游文化卷

四、北京文化卷

五、民族文化卷

六、宗教文化卷

七、历史文化卷

八、艺术文化卷

九、茶酒文化卷

十、中外交流卷

责任编辑 洪文雄

装帧设计 阙 明

插 图 王东男

前言

关立勋 张润峰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渊综广博。它以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为坚实基础，以语言、文字及各种物质成果为体现、证明，以千百代中国人的继承弘扬为延续保证，以流传世界、对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为巨大影响。中国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遗产，是中国人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聚的保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中国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人创造了生产、生活、社会活动所需要的一切物质产品，又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制度和儒学理论影响，中国的一切物质创造，每每带有强烈的人文色彩，即要求各种物质创造必须表现或体现某种精神，使其上升为文化。创造衣饰，绝不仅仅为了保暖；创造食物，绝不仅仅为了果腹；创造居室，绝不仅仅为了遮避风雨；创造车轿舟船，绝不仅仅为了出行方便；创造图书，绝不仅仅为了观览。从衣食住行到都市宫苑，所有的物质创造，都体现或为了体现某种文化即精神境界、思想观念、社会制度、民族精神以及文化传统。

这种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物质成果，有时甚至是精神第一而物质第二了。不然，从一粒米怎会产生“粒粒皆辛苦”的观念？旧衣在身怎会有艰苦朴素的光荣感？没有车驾享受，却仍能以“安步当车”为乐；居室简陋，竟然还高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就是物质文化。

中国更有辉煌的精神文化，这就是在一切生产、生活、社会活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学艺术、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学说思想、道德传统等一切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活动等这种精神领域的成果。没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无从产生；但只有物质而没有精神，就会变成文化沙漠，轻则自溺于物质享受之中，重则导致民族甚至国家的灭亡。在中国以及世界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而且很惨重。

所幸的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不是如此。既重视物质食粮，也重视“精神食

粮”；既抓物质文明，更抓精神文明。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这就使中国文化中具有极丰富宝贵的精神文化——从儒、道、法、墨百家学说思想到佛、道、基督、伊斯兰各种宗教信仰，从社会公德到民族风俗，从文学艺术到科学知识，从名人影响到个人修养，等等。中国甚至形成了不以衣帽取人而以教养评定，不以财产为荣而以知识为重，不以物质为先而以精神第一的传统。在中国社会历史上，从来不把金钱看成万能，从来不把只有物质财产当成光荣。在中国，有文化的人自重也被人看重，这“文化”，就是指精神文化的体现——学识、教养、品德、精神。

中国历史悠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强大，在物质生产、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十分丰富完备的制度文化。就广义范围讲，制度文化也可以纳入精神文化，但二者又有区别——知识学问是精神文化，但科举考试是制度文化；爱国为民是精神文化，但取官任免是制度文化；道德教养是精神文化，但法律刑赏是制度文化；爱情婚恋是精神文化，但婚姻法规是制度文化，等等。举凡对一切生产、生活、社会活动做出各种规定、办法、条款、法律而要求必须执行贯彻的，都是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多是从人民意愿出发而自发形成、自愿接受、自觉发展的，而制度文化却多是从维护统治的角度，人为制定、贯彻执行、不断修订的。因此，精神文化多是人们乐于接受的，而制度文化的自觉贯彻，每每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痛苦的、流血的过程。当然，制度文化在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在尚无更完善者取代之前，人们也会奉为圭臬而遵照执行，使之成为一种准则、一种精神文化。比如科举考试制度、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规定、婚丧法规等。制度文化是必须的，它是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制定的共同准则，因此，长期执行的制度，就会形成时代、民族、传统的特色，会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的概念又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文化可包括人类创造或发现的一切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及精神思想，狭义的则专指带有人文色彩的文化成果。本书所谈的“中国文化”，指的是后者。物质成果没有国界，但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化则是区别国家、种族、民族、时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化植根于五千年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史上，是有其鲜明的民族属性的。

在中国文化中，精华是其主流，正因此，中华民族才会日益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才会历史悠久、长期统一。中国文化是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无可逆转；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剂，难以削弱；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无可比拟。是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民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勤劳敬业、自强不息、团结礼让、勇于献身、忠于祖国。

中国文化是中国的灵魂。

二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这是全世界的思想者都在思考的问题。

唐太宗在魏徵去世时，悲痛反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镜”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真的懂得了研究历史、发展历史的关键所在。列宁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及资产阶级政权后，立即告诫所有青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并极有研究，他诚恳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文化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要了解，要学习。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了解中国文化，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社会、国情、民风、传统，甚至是不了解自己——自己血脉里流动的是什么。对于外国人来说，不了解中国文化，就等于不了解中国。没有对中国文化底蕴的了解，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对他们来说，故宫只是一座砖瓦灰沙垒起的建筑，北京的胡同只是一条条街道两旁的小通道，元宵粽子月饼都只不过是食品，旗袍也只是一种保暖遮体的服装而已。对于这种种事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他们是不能了解的。

当前，中国进入了空前强大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光荣而艰巨的兴国强民使命，使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空前地提到紧迫的日程上。物质文明的大发展，已是有目共睹；精神文明的有待急起直前，更是国人共识。精神文明的建设，新文化的建设，提高全民素质，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地位，都迫切需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和文化传统为基础、为纽带，团结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培养陶冶一代代青少年，才能使全体民众的文化素质适合时代要求，使中国在21世纪能够承担起它的历史责任。

继承发扬中国文化，还有特殊的两个意义：一个是有益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一个是适应香港的回归。

1995年9月至10月，我去台湾讲学，较多地接触了台湾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无论是讲课还是座谈交流，中国文化都是兴奋点。一种共同的文化之根、共同的文化传统，使我深深感到台湾各界多么热爱中国文化，多么渴望文化交流，对大陆有着多么深切的感情！从台北到台中，从基隆到日月潭，处处是浓浓的中国传

统文化气息,使人有一种如在大陆的感觉。血浓于水,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海峡两岸统一的纽带之一,是没有矛盾的话题。合作著书,探讨中国文化,也是目前双方共同的愿望和行动。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祖国,现在已进入激动人心的“倒计时”时刻。目前香港文化界与图书出版界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一项有力的策划——编写出版中国文化的普及读物,预计将大有市场。他们正在寻求与内地的合作。这又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机遇。一百五十多年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有意泯灭香港人的中国心,中国文化被渐渐淡化、排挤。现在,香港人的爱国主义感情激发,他们认准了必须在文化上回归,才是真正的回归,他们在追求有一颗真正的中国心。此时此刻,作为内地的文化界,难道不该有一种宣传弘扬中国文化的紧迫感和实际行动吗?

继承发扬中国文化,目前还有更大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迅捷而频繁,中国文化更为热点。外国留学生、研究生多选中国文化为专攻方向;外国旅游者已人人学会体味中国文化,哪怕是一点点,他们也极欣喜。正如本书历史文化卷序言中所说的,中国现在是举世瞩目,学汉语,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探讨中国的儒家哲学,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中国文化”成了全世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成了中外人士交谈中的话题。以至在长城之上,在太和殿前,在兵马俑馆,甚至在烤鸭席上,外国人的发问、追根寻底,令中方陪同人员也时时难以圆满地给以文化意义上的回答。这日益深入的文化探讨,正以迅猛的声势和速度检验着每一位中国人的中国文化水平。“在外国人面前代表中国”,这个资格的具备,大不易啊!

三

时代的需要,历史的责任,使我们下定决心策划设计、组织队伍,以最大的责任感和全部能力,开始撰写这部大型系列丛书《中国文化杂说》。这是一部涵盖全部中国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巨著。目前出版的是第一批十卷,包括民俗文化卷、宫廷文化卷、旅游文化卷、北京文化卷、民族文化卷、宗教文化卷、历史文化卷、艺术文化卷、茶酒文化卷和中外文化交流卷,共约一千万字。

民俗是文化。无论你走到哪里,民俗都是区别种族、民族、国家、地区、社会以及人群的非常显明的标志。民俗的确包罗万象,在生产、生活及一切社会活动中,民俗都制约着每一个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真是“一饮一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穿着打扮,嗔怨喜乐,无不透出民俗的影子,显出民俗的力量”(民俗卷序言)。民俗文化卷选入10篇文章,从理论探讨到民俗调查,丰富多彩,读罢真令人有对中国更了解了的感觉。其中《民俗学杂谈》令人大有启迪,而写中国鸟文化、三晋文化、生肖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各篇,又使人大开眼界,时而

击节赞赏，时而忍俊不止。

中国文化有从宫廷走向民间和从民间走向宫廷的双向影响的特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宫廷文化集中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宫廷文化的权威性、独有性、华贵性和它的民族性、社会性、兼容性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反相成的，这就形成了皇家集团的特殊于民众而又向民众显示“同乐”的特点。打开宫门，走进历朝宫廷，把皇宫的珍秘材料摆出来，见见太阳，让读者自己去辨别一下中国文化中宫廷文化与士大夫文化及民间文化的区别，这一点，宫廷文化卷的作者们做到了。说帝王和后宫的文章，使人如实地看到了历代帝王《起居注》上没有写下的东西。谈皇宫禁苑的，真使读者领略建筑的同时，看到了帝后王妃们的心态。写礼仪的，详细到可以给电影导演们拿来拍古代故事片时直接写分镜头剧本。皇宫珍宝一文介绍的，更是参观故宫时难以寻觅的。此卷共收文8篇，作者皆为故宫工作人员，他们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了。

中国旅游文化究竟从何时算起？旅游文化卷的作者几家争鸣，帝王巡游封禅说，魏晋勃兴说，都给读者以启迪。此卷共收文11篇，其中中国岩画、长城及中国各个关隘的介绍，使人大开眼界、大长知识，而叙述敦煌与上海文化的两篇文章，各有灼见，引人深思。旅游在中国，方兴未艾，可预见的未来内，只盛不衰。怎样选题，怎样谈旅游中、景点里的文化，这还真是一个大有可做的文章。

中国的地域文化中，北京文化应是最有内容了。此次北京文化卷较系统而全方位地组织了稿件，从北京的中轴线写起，直写尽了北京的胡同、园林、宅院故居、会馆、老字号、寺庙、塔、桥、墓葬及文物、名人等，12篇文章篇篇翔实、确切，尤其是宅院故居和北京名塔的作者们，实地勘察，一一记录、摄影，虽然介绍详于剖析，但弥足珍贵。北京文化特点突出且有典型意义，悠久的历史、长期的国都，使北京特有一种“天子脚下”的气派与大度，这不仅反映在北京的宫苑建筑上，更表现在“北京人”身上，人与景物、事物的结合，立刻就能把北京与其它地域（哪怕也是大城市）区别出来。能抓住这一特点，就抓出了“北京味儿”。今后的地域文化各卷，相信会在“特色”上大做文章，使中国文化展现其多姿多彩的风貌。

中国有56个民族，有极为灿烂而悠久的民族文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目前中国民族文化的研究，多在表象，多写“是什么样子”、“有怎样的历史过程”，而深入地剖析其文化内涵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历史过程”，所见不多。至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及发展方向的预测，则更有待力作。民族文化卷在这几个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关于中国古代粟特人的入华与消融，古代游牧民族及大小长短部落政权的存亡，都有文章做了清晰的介绍，并有一定研究见解。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交融及在中国文化发展上的相辅相成作用的阐述，也能综述并有较独到的见解。此外，系统介绍分析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字、服饰、器乐及禁忌的文章，也给了读者以丰富的见识。本卷共收文13篇。

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发展，宗教文化卷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

教以及中国民间诸神各类内容,可使读者有系统的或某些方面的了解。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宗教建筑加教徒,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广泛而敏感的联系,宗教还必然与所在国家的文化传统尽力糅合协调,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所以,中国的佛教虽然来自印度,却一变再变,成了几乎与原印度佛教大不相同的中国化了的佛教,不仅教义有所变化,连雕塑的偶像也中国化了,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宗教现象的研究,才是研究中国文化而不仅仅是罗列资料。本卷共收文12篇,其中关于北京传教士墓地沧桑的文章,正是做出了这种努力,其第一手材料的占有和令人信服的文化背景分析亦属难能可贵。云居寺一文更是以历史为线索,写出了两种文化的撞击和相持,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在诗一样的语言中进入沉思。

历史文化卷卷名不科学,因为不像其它卷,没有特指范围,这是要向读者略作解释的——在全书组稿过程中,入选文章中有一批质量较好却又不好归入其它九卷、或本属设计中某一卷而稿件未齐不能单独立卷的,舍弃等第二批又延误了作者的发表,于是就将这批文章合编为一卷,费心地起了个卷名。尽管如此,全部13篇文章还是“有章可循”的,即都是在谈历史上产生的种种现象和事物,况且多数文章有一定水平,请读者不必计较篇名,仍是在谈在中国文化。在中国近2500年的历史中,儒家学说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全体中国人,不受儒家影响的,可以说没有。那么,儒家学说的精华是什么?《儒学精要》一文极概括并准确地进行了总结,很值得一读。剖析皇室婚姻一文的作者,在尽览几十种类图书之后,颇富文采地以女性的目光精辟地分析了中国历史上这一文化现象,三宫六院里那“高处不胜寒”的冷酷,实际上是中国婚姻文化的一个极端的解剖。本卷中谈衣食住行的各篇文章,会使读者透过各种历史演变,察出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涵。

艺术文化,是人人皆可历数若干内容的“标准”的文化,书法、绘画、雕塑、篆刻、玉器、漆器、风筝、京剧、杂技,收入本卷的14篇文章,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可贵的是,本卷文章没有泛泛而谈、人云亦云,而是以生动事例和图像系统介绍评议了上述种种艺术类目,一读之后,读者自可就以上各类艺术“胸有成竹”、俨然行家了。卷中百幅印章插图、四版脸谱图像,弥足珍贵,也为本卷增色不少。

茶与酒,和绝大多数人都有“不可须臾无此君”的关系,然而,名茶名酒名在何处?茶酒各有什么富有文化色彩的典故、传说、习俗?茶酒在中国历代各阶层人士的生活中产生过什么影响?茶酒对中国饮食及其它文化的贡献是什么?品茶饮酒,谁解其中文化滋味?一杯茶、二两酒,竟写出了百万余字,作者们还说言犹未尽,读者呢?

中国与世界各地、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久,内容广,影响大,至今更加规模空前。本卷所收12篇文章,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全部中外交流的历史,分国家、区域地逐一总结评析,使人看到了这种包括物质、精神、制度等各方面的交流,怎样增进了友谊、发展了文化、增强了国力、促进了交流各方的交融与变化。本卷

的序言中，对中外文化交流提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探讨，很有见地。

四

本书的写作体例主要是一条：科学性（知识性）与可读性（趣味性）相结合。

本书入选选题皆为对形成中国文化传统、思想意识、民族精神、百姓心理等有巨大影响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内容。书名“杂说”，并非信马由缰、随便去写，而是要求：一、必须写出选题所要求的应有的知识，尽量系统、准确，注意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和最新发现；二、要求深入浅出、文笔生动、可读性强，能吸引读者。

由于参加本书写作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学有专攻、业有所长甚至多有著作出版的专家学者，所以，在文章的科学性即知识性方面，不必操心，“不用扬鞭自奋蹄”。作者们从来都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准确性、最新时效性，送来的定稿证明了这点。

倒是在可读性即趣味性上，一部分专家常常被提醒：一定不要写成学术著作或论文，这种“杂说”性质的文章比学术论文更难写。现在看来，多数文章做到了以下几点：一、旁征博引，纵及古今，以信息量大取胜；二、运用典故、故事、轶闻，以趣味盎然取胜；三、有精辟、独到、深刻的见解，以思想性哲理性取胜；四、叙述方法新颖，语言生动精练，篇章结构出新，以文笔取胜。四个特点，都首先保证科学性即知识性。以上，可以做书名“杂说”的注释。

本书共收 124 篇文章，参加作者 140 人，其中北京作者 126 人，外地作者 14 人。作者中，高校教师 59 人，研究人员 30 人，出版社编辑 29 人，其它 22 人。自 1995 年 7 月策划，迄今约两年的时间里，全体作者以敬业精神、各分卷主编以负责精神，通力合作，按预定计划完成了本书的各项工作。

两年里，每每和作者谈话或通电，大家一致的感受是：为弘扬中国文化，劳累辛苦是幸福，是寄托。无论所写选题是多年专攻的领域，还是此次才开辟的新课题，都感到两年辛苦成文，自己也颇有收获，如同又上一层楼。交出稿件之时，掩卷而思，颇感欣慰。

愿本书能使每一位读者更加了解、更加热爱中国文化！

一九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序 言

刘晔原

一

中国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人文景观渊懿朴茂，如同一座璀璨的宝塔，放出东方文明的耀眼光辉。文明的国度，不仅有丰富的典籍，辉煌的建筑，周到的礼仪，而且有丰富多彩又相对统一的民间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有无待于政令法律约束而自觉遵守的风俗习惯，有普天同庆的传统节日，……文明化做了春雨，润进了华夏大地、文明如同甘泉，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形成了历代相传、共同遵守的生活模式，铸就了支撑华夏文明大厦的坚固的基石——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重在成“俗”，约定俗成、反复出现又被广泛遵行；它包罗万象，囊括生产、生活、思想、行为，规定了人一生的各种仪节，制约了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它又那样琐细具体，一饮一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穿着打扮，嗔怨喜乐，无不透出民俗的影子，显出民俗的力量。因而，民俗是一种文化，是使沙石聚结成岩石的凝固剂，是使亿万人团结成民族的亲合力，是培养同根之亲、炎黄亲情的长江黄河。所以，了解民俗，就是了解我们的民族，就是了解我们自己。

民俗文化，重在于民。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是其生存的手段；乡野村落，市井阊阖是其生存之地；亲戚往来，儿婚女嫁，喜事相贺，哀事相吊，是其主要交际场合。此外则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因此它不同于帝王将相庙堂揖让仪注，也不同于各公侯巨卿宦海沉浮，既无才子诗赋之雅，也无佳人悲秋之叹；它是乡野山花，自生自长，装扮春天而无娇矜之态；它是家酿浊酒，醇厚甘甜，沁人心脾而无醉人之意。平淡朴素，绝无铅华。然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蕴、世态人情、风土习尚，信仰氛围、审美追求乃至道德规范、伦理标准却又那样鲜明、真切地坦露在民俗文化之中。因而重视民俗文化，就是重视下层社会的生活史，重视创造历史的芸芸众生的心路历程。

二

民俗学的天职就是面向民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把丰富多彩、移步换形的民俗表现梳理起来,集中起来,探求其源流,分清其优劣,找出其成因,析出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既重视中华民族共守的风俗之森林,又尊重中华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的独有的风俗奇花;既着眼于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传统,又关注现当代社会的需求;既要弘扬传统民俗中的优秀风尚,又不掩饰和回避其中封建性的陋习鄙俗。从而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关注当前与未来,促使社会习尚向科学、文明、进步的方向转化,最终达到移风易俗、提高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程度、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宏伟目标。

民俗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整体,是下层社会生存的实情。研究梳理民俗事项,首先就要具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这就是着眼于主流,实事求是,彼此尊重。

提出这个命题是有针对意义的。

在现代科学意义的民俗学调查开展之前,一些西方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就曾在其旅行杂记、探险琐记之类的著作中记录了东方国家、非洲国家以及大洋洲土著民族的风情习俗,成为现代西方民俗学调查之滥觞。这些旅行家和探险家多是生活优裕、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人,他们以惊异的目光“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所处社会行为准则的新奇的人群,看见了奇异的社会组织以及生活情态。他们对此既不承认这也是一种“文明”,更感到难以理解,当然也就无意探寻其形成原委,只是因奇而录,因而他们的记录特点是“猎奇”,是“志异”,摆出奇风异俗以供沙龙中的先生太太解颐一笑。这样的民俗记录,当然既谈不上系统,更谈不上科学。

现代民俗学科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出现了大批的产业工人,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产品极需海外市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已达英国本土面积的一百多倍,这种形势迫使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了解殖民地的文化、正视殖民地的习俗,以便制定统治政策,推销产品,掠夺原料。

在西方民俗调查方面也反映出这种殖民主义需要。英国早期民俗学家班恩(Burne)女士在她所著《民俗学概论》一书中说得明白:这门科学(民俗学),这种研究的结果,对于统治国支配下的从属种族,当然要产生改良的待遇。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是为探求殖民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心理习惯、以便使统治政策适合殖民地而容易被接受。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和宗主国心态,难以实事求是地对待各国独创的民俗事项。这种民俗学研究,虽然摆脱了探险者的猎奇和零散,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却又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泥潭。

另外，在西方文明至上的观念下，一些民俗调查者专门搜集其他民族的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早已消亡的事项，并对这些现象大肆渲染，着力把持不同文化的民族描绘成野蛮、落后、未开化的民族，极需殖民者和西方救世主来拯救、启蒙，甚至以民俗文化形态的不同为借口，为其野蛮的杀戮灭绝制造舆论！

对此，我国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文化只有形态不同而没有文野之分。世界各地由于地区、种族、群体等因素的差异，使民俗形态相对独立。加之交通、通讯方面的历史限制，形成各民族相对封闭发展、彼此缺少了解的状态，偶尔一遇异态，便觉得相去甚远而难以容忍。但并没有理由断定对方的民俗文化就整体而言是落后或野蛮的，任何期望以一己的习俗代替其他民族民俗文化的企图，都隐含着“文化沙文主义”的怪影，都是以己度人，缺少尊重他人文化创造的殖民者的遗弊。

三

民俗文化，作为民族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免时时感到它多侧面的存在所带来的扑朔迷离和难于把握，因而分析、认识它时，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当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指导理论。

民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穿越过各种性质的社会，不能不受到该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思想的浸润和影响，积层繁复，错综复杂。尤其是古代口头民俗的部分，记录者的主体精神无不渗入具体民俗的记录之中。对于远古和记录者所处的时代道德、生存形态以及家庭婚姻观念的不同理解，常常使他们对于自认为“不可能”、“不雅驯”的部分加以改造，并给予“合理化”的解释与改变。这使得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民俗的资料离它所产生的时代和形成的直接缘由更加遥远隐晦，甚至难以确定其属于哪一时代，哪些情节是原生态，哪些是附加和改变后的再生态，又经了过几次改变。

几千年沧海桑田、刀兵血火、南渡北迁；多少次立法尊儒，崇佛兴道；终南捷径与雁塔题名的不同崇尚，清静无为、长寿神仙与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对立趋向；下层人民摆脱贫困和对更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切，都使民俗文化在强大的具有诱惑力的社会主导思潮的引导和现实功利目的的制约下，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乃至形象表现、行为模式等方面都打上重重的多种时代烙印，深刻之处甚至如生根铸铁一般难以删除磨灭。对此，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才能进行具体的分析，并得出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科学的结论。

我国古代重视记录口头民俗，并从中分析政治得失，即“观风俗，知得失”。重视下层人民的反映，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的闪光之处。记录下来

的口头民俗为后代保存了古代民风习俗以及当时社会的行为标准。尤其像《诗经·国风》中表现的先秦下层社会的风貌，已经是难以再得的宝贵财富。春天的采集、秋天的收获、男女的交往，婚姻的成功与破裂，以及在《大雅》、《颂》中有关弃子拾子的行为，战争衅鼓和宗庙献俘的热烈，神化其父、祖与上帝同在的荒诞，无不显示远古民俗的风采。

另一方面，自周代张扬道德以来，古代民俗的记录也带上了浓重的政治功利和道德伦理色彩，“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及“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使许多民俗的记录难以保持平常心和真实性。一旦事关道德善恶，总会被记录人或多或少地加以变更，使之趋于合理，趋于扬善惩恶。以这种心态去记录，去诠释古代的民俗，自然难免引人入歧途；而以这种心态去记录其所处时代的民俗，又不能不主观取舍甚至臆造强说。

纲常名教成为主导思想之后，封建主义集权也更加严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一些与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正统思想相违背的民俗，就更无缘被记录了。因而中国虽然以典籍大国著称于世，但是真正涉及民间习俗文化的著作，也只有人所周知的寥寥数种。散见于文人笔记或其他著作中的民俗事项记录，也往往蒙上封建文人的某些偏见歧视之网。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民俗，不啻是一种宝贵而有用的思想方法。

四

民俗文化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实践性是它的最大特点。如何在实际的民众生活之中考察民俗事项，是全面了解民俗文化实质的前提。我国幅员辽阔，兄弟民族众多，各自经历的历史进程和互相影响融合的程度，差别极大。同样的民俗事项会有反差极大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心理和信仰的依据，离开了具体的调查研究 and 个例分析，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便常常会陷于个别事项的表象现象之中而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尤其涉及与巫术、信仰、仪式等方面有关的事项时，甚至会分不清主次、混淆源流，使总体把握亦随之偏离。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民俗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它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基础。整理民俗事项、主要是了解历代下层人民的基本的生活情态，这自然无法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有关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性质的民俗事项，而这一点又恰恰被一些民俗文化研究者所忽略。虽然，在理论上、理智上承认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活动的主导性和决定性、但是在排列、采集民俗事项之时，却往往着眼于花花绿绿，神神鬼鬼，着力于“原始信仰遗留”、“巫术仪式痕迹”等方面的探索。相反对生产习俗、物质民俗以及常规性、主流性的行为准则却缺少热情。有时甚至会混淆个别和一般、颠倒因与果，把现象当做本质。例